

社會化

一、前言

社會化是讓個人取得適當的價值、態度、行為模式成為合宜的社會行動者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秩序也因而建立起來。著名的美國人類學家 **Margaret Mead** 是一位探討社會化過程非常重要的學者，她認為要有系統的討論社會環境對於嬰兒、青少年的影響(社會化)就應該以社會關係或社會結構相當單純的社會為研究標的，因為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發現是那些機制、什麼樣的主要行動者在影響新進的社會成員。我們從 **Mead** 在薩摩亞與新幾內亞馬努斯部落的民族誌研究討論起¹，看看小孩是在那裡、什麼人、透過什麼方式來教導？**Mead** 更令人敬佩之處在於她透過不同原初社會的比較研究，思考美國社會教導小朋友的根本問題。

薩摩亞人就是一個非常隨和的社會，沒有人因為特定的目的拼到你死我活，人際間的衝突都是在短時間內解決，而且是透過一個人的離開就得到解決。人們不會輕易爭執，進而發動戰爭。任何人的生活調性快慢不會被別人打擾，而身心發展緩慢也不是可恥的事，每個人都得到高度的包容。**Mead** 看到薩摩亞部落的女性生下小孩後就立刻交給六、七歲的女孩照顧，母親基本上是不負責照顧嬰兒的，女孩只有到十四、五歲時才能脫離照顧幼兒的責任。**Mead** 說「嬰兒初降人世後幾個月，就從一個女人手中漫不經心地遞到另一個女人手中。這樣，人們出生不久就學會了不對任何人過於關切，也不對任何人寄予過高的希望」。

薩摩亞人和父母親並沒有深刻的情感，而是和部落或家族的成員都普遍性地在有許多互動，青少年也可以主動的選擇要居住的家戶，因此父母親在小孩社會化的角色是很有限的。反而是六七歲或是更年長的青少年是教導幼兒的主角，而之後「在十六、七年中，薩摩亞年輕人的行為的主要人為決定因素是一直是他所屬的年齡團體的標準」(p.183)。另外，**Mead** 指出薩摩亞的少女在青春期時沒有經歷過狂飆的情緒矛盾、與父母親的激烈衝突，而是平順的渡過人生的重要歷程，主要是因為她們隨和的社會價值，對於生命誕生、死亡、離婚、事業成就都非常的平淡，甚至於那些早熟、突出的人是貶抑的。至於性對薩摩亞人來說是自然又令人愉快的事，每個青少年都有充分享受的自由，因此她們不會太早結婚，而是盡情的透過不同的方式結交異性朋友，享受性生活，這是另外一個原因青少年青春期是毫無困難、沒有情慾的壓抑。

¹ 米德，馬格麗特，2004(1961)，*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少年心理研究* 台北：遠流；米德，馬格麗特，1992(1975)，*新幾內亞人的成長：原始社會教育問題的比較研究* 台北：遠流。

新幾內亞的馬努斯人崇尚財富，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權力來源是由他擁有資產來決定的，所以每個男性都拼命工作累積財富，所以小孩從小就被教導要尊重別人的財產，未經允許使用別人的東西必然受到嚴厲的懲罰。對於小孩的照顧是母親的責任，而不是交給小女孩負責。父親必須分擔對於子女的照顧責任，他們在男孩長大過程是主要的教導者，男孩和父親有著極為緊密的情感關係，前者對於後者是主動認同，而不是敵視、仇恨或恐懼的，男孩是樂於繼承父親的工作和人格特質。

這兩個不同的原初社會彰顯出完全不同的社會價值、社會化的主角、社會化的機制，所以我們不可以認為所有的社會社會化過程都是類似的、這些社會所追求的價值都是相同的，或幼兒、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經歷的軌跡與問題是相同的；當然，造成的個人和社會的後果也是不同的。薩摩亞族群是安適、隨和的，人們沒有競爭、極少衝突，不過他們長大後對於父母親是冷淡的，絕對不是一個孝道社會，而馬努斯部落則是在人際關係中充滿緊張關係。

從人類學的討論回到社會學對於社會化的討論，其中最主要的論點是由芝加哥學派的 Charles H. Cooley 所提出來的，他認為兒童形成自我(self)的概念是來自於，和他人的社會互動，他提到的社會互動是相當具體的，就是別人對於社會行動者的回饋，可以是語言的、肢體的回饋，我們對於這樣的回饋會進行評價後，然後再建立對於自我的想像。Cooley 使用鏡中之我(looking -glass self)的概念來描述這樣的過程。對於 Cooley 來說，”I am not what I think I am and I am not what you think I am. I am what I think you think I am.”。Cooley 理論最關鍵的論點就是，自我的形成是經過別人表現對我的看法，但是別人不會直接影響我，必須要我讀了(詮釋)別人的看法之後，再來影響自我的內涵，社會行動者不接觸別人給的資訊、不詮釋，別人對她是沒有影響的。當我們看到別人對我的評價，經過閱讀接受了，就會變成主導我對自己的看法、影響我的行為，這是一個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過程 (Eitzen, 1985:145-146)。

Cooley 的觀點是社會學社會化理論的基礎，自我的形成是受他者的影響，而不是自我心靈狀態(能力)的演化與完成。後續社會學的探討，除了從日常的互動外，也逐步探討家庭、學校、職業團體、軍事組織的社會化，而且相當清楚地分析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對於社會化的接受者所造成的影響。

社會互動對於兒童的社會化有多重要？一般的社會學教科書，都會指出泰山兒童、或者是從出生就被父母隔離關在幽暗小房間受虐兒的故事，來說明缺乏社會互動是無法讓生物人變成社會人的。另外，要對照生物遺傳和社會化的影響，因為戰亂或是其他因素被分離的雙胞胎，成長之後再相逢，她們雖然有相同的基

因，但是家庭等環境不同，價值立場都不一樣。

1. 社會化是持續的，社會化應該擺在生命週期來看，而不是在青少年或是兒童期就完成的。所以社會化的理論不應該集中在兒童期的研究。青年、中年、老年的社會化應該是重要的課題。例如，在不同時期社會化有其主要的議題，青少年的叛逆，青年的職業社會化、家長角色的社會化，中年的中年危機，老年的去職業化的角色、再依賴角色的形成、死亡。
2. 社會學社會化的觀點基本上是向 **nurture**(教養)的立場傾斜，與社會生物學的立場不同的，人的生物性是不可否認的，但是人的創造與社會建構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超越生物特徵的限制。
3. 社會學在社會化的討論中對於人性的基本假設不是善的、也不是惡的，而是中性的，高度可被塑造與自我創造的。但社會是有一套相對不容易變動的價值，會透過社會化教導給下一個世代延續其核心文化。
4. 社會化是動態的，不斷建構的，而不是刺激反應論或外部制約論。
5. 社會化是透過面對面社會互動傳遞社會的核心價值給新進的社會成員，只透過媒體或是網路資訊的交流無法達成社會化的功能，因為學習一套社會核心價值是要教導者透過實質溝通、演練、指導和以身作則來完成的²。
6. 社會化與社會結構或是社會制度的關係非常密切，性別體制、階層體制，家庭、同儕團體、學校、職場、傳媒對行動者社會化過程造成影響。
7. 社會化是多樣的過程，不是單一線性的。

二、生命週期過程的社會化

(a-1) 兒童社會化：以嚴酷教養為例

家庭是最早出現的社會化機構，而且是我們無法選擇的，子女在家庭中如何和社會主要的推手—家長的互動是非常重要的，當然也是社會學者關心的課題。吳齊殷的論文就是從家庭教養的來探討子女如何被教育，他挑出在華人傳統社會可能是最普遍的嚴酷教養方式當成研究重點，探討父母親教養子女是不是受到上一代教養方式的影響。根據研究顯示，以嚴酷或暴力教養子女，這些子女長大後，有很高的機會採取同樣的模式，教養他們衍生家庭的子女，台灣的資料顯示出高達五倍的機會。

有多少現任的父母親（1990年的調查）當小孩時被嚴酷教養？68%以上的父親或母親都被打過，不過父親被打的母親高。30%以上的現任父親被甩耳光或打其他部份的更嚴厲處分，母親則比較低。這些父母親中，有60%的父親打過小孩；79.4%的母親打過小孩。不過在罰跪與甩耳光的比率比起上一代要降低很多。

² Jacobs, Jane. 集體失憶的年代。

這樣的現象怎麼解釋呢？第一個說法當然是針對當事人（就是現任的父母）他們的嚴酷教養方式的形式，大致上有三種觀點：a)模仿，每天觀察父母親對自己的實作，罰跪、打手心、甩耳光等等，頻繁地觀察、不自覺地習得這種教養模式，因為密集觀察、且沒有看到其他替代方案；b)社會學習，先發展出嚴酷教養的價值觀，採取嚴酷教養方式來對待自己的子女；c)理性選擇，仔細評估各種不同教養方式的優缺點，認為嚴酷教養是對自己子女最有用的模式。吳齊般的研究顯示，嚴酷教養是經過模仿，而不是社會學習、理性選擇的過程，父母親對於自己的嚴格教養不大會影響自己對於嚴格教養態度的強烈程度，只要受過嚴格教養的人，就比較有可能採取這種方式對待他的小孩。另外，教育程度提高，無論對於父親或母親採取嚴格教養方式對待小孩都有降低的作用，所以教育是可以減緩父母採取較為殘暴的教育手段。

第二種說法就是，嚴酷教養模式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華人社會是尊重權威、相信權威，也肯定勤教嚴管是有用的，所以形成一套青睞嚴酷教養的模式，整個文化風氣鼓勵父母親採取這樣的方式。或者，嚴酷教養會受到現任父母親教育與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家庭環境較為富裕者擁有比較多的資源管教小孩、提供小孩試錯的空間，嚴酷教養比較不會發生；而教育程度較高者，除了有能力評估不同教養方式外，也懂得尊重子女的人格身體權、以及相關法律對於未成年人的保護。根據王震武與林文瑛(1995)的研究，傳統文化的因素對於父母選擇子女教養的方式影響不大，主要是家庭互動的情境因素、父母性格因素等。

吳齊般的研究告訴我們的就是，我們在家庭如何被管教，透過模仿我們會複製這樣的模式，這說明身教的重要性，同時也要了解暴力管教是一個惡性循環，父母殘暴管教，子女未來以同樣手法對待他們的子女，終究會形成暴力家族。不過好消息是，教育程度的提高是有助於降低不合理的嚴酷教養方式。從吳齊般的研究我們也發現 Cooley 的理論似乎不是那麼是適用，社會化的過程有時是透過模仿的，而不是詮釋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後，再發展出態度或行為。頻繁、持續的社會互動（挨打）也是有可能塑造一個人的行為。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也是 Cooley 的理論無法回答的，就是父母透過嚴格教養和子女的互動，居然沒有影響子女的態度（特別是對於嚴格教養的態度），我們有興趣知道嚴格教養是否會養成權威性的人格（我們將這些人認為自己教養子女的方式也是要嚴厲的當成權威性人格的一部分），吳齊般的研究指出是沒有。為什麼父母在互動過程告訴子女，妳要是不守紀律要接受處罰、子女不會認為自己是壞孩子？不會發展出遵守權威命令的自我？不會因為自己遵守權威，也要求別人同樣的應該遵守權威？

教養子女方式在當代台灣社會是顯現出甚麼樣態呢？藍佩嘉(2014)年的研究可以提供我們一個清楚的圖像。她是以 1965 到 1985 年出生的父母親為對象，

探討他們教養子女的方式，為了要展現出差異性，因此她區分出中產階級(專業工作、教育程度大學以上)與勞工階級兩種類型。這樣的區分是有意義的，根據石易平(2019)的研究指出「中上階層白領父親偏好發展孩子的自主性，但藍領階級父親則偏好服從價值(此處的階級以職業來定義)。代表自主性價值的指標為：期待孩子對任何事情都抱持好奇心、期待孩子擁有想像力、以及期待孩子探索事情發生的原因」³。據此我們可以合理推論，中產階級的教養腳本通常是和她父母親那個世代明確區隔，他們並不想遵循父母親嚴酷教養、缺少有品質互動的模式，因為那是過時、不符合當代子女的生活經驗。但是更為宏觀的角度來說，不同階級的父母親的教養腳本也受到全球化這個因素的影響，主要是來自於人員流動的經驗和文化傳播的影響，中上階級的父母親留學經驗或是國外工作經驗，自然會接受到異國的教養模式，影響他們的教養腳本；相對來說，新移民家庭的母親則是因為國際遷徙，在一個異國環境教養子女卻因為歧視、語言能力等因素被當視為不適格的母親，或是只能採取服從腳本的父母。最後，中產階級的教養方式和勞工階級的腳本並不是獨立存在，當中產階級的教養論述或是實作成為主導論述時，勞工階級在學校、社會的教養運作就會受到區隔化與差異化，甚至於更極端的操作有限的教養腳本，因為他們沒有相當的資源、時間、能力來模仿主流作法(藍佩嘉，2019)。

中產階級的學習教養方式是積極應用他們的教育能力，透過閱讀、討論、參與工作坊等來累積他們教養子女的論述和規劃出教養腳本。其次，他們也會應用專業工作的技術和知識(例如，方案管理、同理心溝通等)來進行子女教養。最後，他們自身失落童年的經歷會成為建構子女純真童年生活非常主要的參考點，他們希望自己的子女擁有無憂無慮、開心快樂的童年。中上階級的父母親教養腳本會和勞工階級不同。

有了這個腳本，具體的實作就會包括：1)父母親積極和子女互動溝通，並且成為家庭中主要的陪伴者，同時扮演父母和玩伴的角色；2)刻意使用文字和肢體語言表達華人社會最不擅長的情感；3)主張透過講道理和協商來解決親子間不同的意見。不過要做到這些事情，父母親必須要有足夠的金錢、時間和知識能力，即便中產階級家庭都不容易擁有這麼充足的資源。例如，要有錢提供課外學習、才藝學習，父母親要長時間工作，沒有空閒陪伴子女。中產階級的家庭對於子女教養的策略基本上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培養國際競爭力；二是規劃的自然長大(另類教育體系)。

勞工階級的教養腳本不是和他們父母親世代斷裂，而是世代延續的比較多，因此嚴酷教養的模式成為主流，只是通常會加入打罵是疼愛才做的。採取這樣的

³ 石易平，2019/9/10。”台灣孩子的第二輪班:課外活動中的階級、性別與社會界限”，巷仔口社會學。<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9/09/10/shihyiping/>(瀏覽日期 2019/9/17)

模式是因為勞工階級缺乏溝通討論教養模式所需要的時間、金錢和知識，特別是工作不穩定、缺乏教養知識的學習管道、長時間工作的情況下，更不可能做到。在藍佩嘉的研究發現一個相當有意義的現象，就是缺乏論述和清楚表達自己教養方式的能力，常常會使得勞工階級的父母親透過外顯的體罰來展現自己是認真教養子女的，擺脫他們是不稱職父母親的指責。勞工階級對於中產階級的溝通教養模式也經常提出質疑，認為講道理要邊打邊講才有效果。勞工階級的教養策略和實作也可以分為兩類：1)培養階級流動力；2)順其自然造化。

兩個不同階級父母教養的策略和實作相當類似，但是真正運作還是有明顯的差異。以都希望子女出類拔萃的教養策略來說，中產階級會讓子女學習各式各樣的才藝和學科，是一種雜食性安排；而勞工階級則是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專注於學科的加強。不過未預期後果經常是小孩課外學習安排太多，反而無法、沒有能力自主學習，規劃自己的時間和活動。中產階級的父母親(主要是母親)會儘量安排時間陪伴小孩，但是課外活動的費用相當昂貴，雙薪家庭的父母需要全力工作累積經濟資源(許多父親是選擇薪資比較高的外派國外職位)，因此將這些課外活動接送外包是普遍的。至於勞工階級的家庭，需要更長的時間累積資源，因此所有課外學習都是外包的。勞工階級的父母透過積極培養子女考取好學校，對於自己階級的生命經驗基本上是否定的，世代之間是沒有經驗學習和傳遞的可能性，代間的差距是會擴大的。

透過自然教養的兩種階級父母也存在著顯著的差別，中產階級的家長(通常是母親)要選擇另類學校、實驗教育，因此必須搬離原來居住的地方到鄉村地區，並且需要建立一個緊密的社群來發展出一套紮實的論述來回應外界對於這種教養方式的質疑。他們也要能夠利用自己所擁有的知識和能力，提供子女學習上所需要的指導。中產階級的父母選擇自然教養主要的理由是要讓小孩適性發展、自由選擇。至於勞工階級選擇自然教養，則是來自於認命或是對於現實教育制度的順從，因此父母親課業不佳，上課學習沒有成就，所以不想逼迫自己的小孩。通常這些父母親生活在農漁村，因此自然教養是水到渠成，不需要大費周章搬家或是找同伴⁴。

藍佩嘉(2019)特別指出父母親的教養策略不見的有效果，就是沒有保障子女未來安全的效果，最主要的理由是個人主義式的解決問題方式，以及壓縮的台灣社會現代性。前者是說明子女發展或社會化的問題並不完全是個人的、家庭的，還牽涉到國家資源分配、階級衝突等結構面向，如果家長和小孩都是認定透過個人努力(提供教育機會、規劃學習方式、對於子女處境進行風險管理等)就可以解

⁴ 延續這項親職教養研究，藍佩嘉(2018)年將過去訪問台灣與美國一百多個家庭養育子女的研究成果，撰寫成 *養育全球家庭*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由美國的史丹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非常傑出的成就。

決所有教養問題是錯誤的做法，是一種淪為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模式。另外一方面，公眾所生活的社會環境並沒有提供充分且平權的教養支持制度、適性的成長模式，主要都是依靠家庭資源來進行教養工作，當然是不可能解決問題。

藍佩嘉的研究是如何展現社會學的理想呢? 1) 階級位置與階級互動會影響父母親對於益品和學習風險的評估，最後影響他們的教養方式和風格。換句話說，父母親教養方式的選擇並不是單純的個人決定，而是受到更大的階級位置、教育體制和全球化等因素影響。家長與子女社會化過程的個人自傳要和整個社會(國家與全世界)的歷史連結在一起，且教養方式不是個人煩惱而是一個公共議題，因為這些決定可能會強化已經存在的家庭間社會經濟不平等。從社會化結果來說，父母個人選擇的保安策略太過於新自由主義，教養失敗就會課責個人而不是制度。另外，保安策略不保安是因為壓縮的現代性，以及過度的以父母規劃和選擇干預子女學習讓它們失去學習興趣及獨立性。

(a-2) 兒童社會化：情緒、文化與道德社會化（以羞恥感為例的探討）

羞恥感在華人社會就不是罪惡感的對照，它也是有內控、道德的意涵，西方學者不了解華人文化，將羞恥感貶低為缺乏內控、野蠻、精神狀態有問題、反省能力等是種族中心主義。羞恥感和情緒有關，這是沒有錯，不過它有很強的道德意含，知恥近乎勇、知恥和理想、知恥是一種美德、知恥和人格的關係常常是古書討論的議題。羞恥不只是個人的事情，也是家族、朋友的事情，一個人不知羞恥也會影響家人、朋友的面子。由於華人社會對於羞恥感的重視，因此透過羞恥趕在兒童時期來進行社會化是相當重要的親子互動的內容，不過因為羞恥感的社會化包含強烈的情緒面向，社會化過程是痛苦的，還好作者的研究指出在兒童到青少年階段，父母親就不會啟動羞恥感的社會化機制。

研究的 140 小時實地觀察，一共有 352 件的羞恥事件，每小時 2.5 件，羞恥事件發生的時間占觀察時間的 5%，作者說羞恥事件是親子互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羞恥事件要有羞恥語言的出現，包括羞羞臉、叔叔不愛妳、我不要妳、不乖、土匪、骨頭是不是很癢、不收玩具就丟掉等等。78%的原型羞恥事件，孩子都即時停止，但是免不了長時期的疲勞羞辱性語言轟炸或處罰。更有趣的是，副型羞恥事件，兒童過去犯的錯不定期會被家長拿出來檢討，這個副型羞恥事件最精彩的地方是，兒童沒有現場被處罰，而是被帶進來討論自己那裡做錯，當成以後修正自己行為的檢討。這是啟動羞恥情緒，加入家人和兒童的討論，建立起道德的內涵。以 Cooley 的理論來說，副原型事件就是爸媽幫忙啟動鏡中之我的機制，要自己照鏡子。當我在鏡中看到自己，自己詮釋，那是不夠的，爸媽還要在旁邊幫腔檢討，建立起具有道德性的自我。

羞恥感社會化的第三招，就是建立連鎖羞恥事件，將過去發生的、現在被處罰的、以及防範未來的都加進去。我們可以說，將鏡中之我、當場的體罰（嚴酷教養）、預期社會化等三個機制整合在一起。

作者說「羞恥事件絕對是由不知羞恥到明白事理的管教過程。它只不過是在過程當中，投入了情緒，以企圖達到更加強化之效果。家長們以羞教恥，不單僅是在於培養對他人可能的想法、評價、批判之敏銳度而已，由重複累贅地體驗、模擬演練當中，父母更好似在引領幼兒培養審視自己言行的自省能力」（頁 42）。不過作者可能沒有注意到啟動情緒帶來負面的後果，為什麼教恥要讓小孩在那種情緒壓迫狀態呢？沒有更好的方法嗎？這是因為像吳齊殷說從模仿來的嗎？還是因為文化的影響呢？

讀完這篇文章需要掌握議題:

1. 羞恥感與罪惡感有何差別？東方社會或是比較落後的社會只有羞恥感，西方社會發展出來的比較高階的罪惡感嗎？作者提出甚麼樣的批評呢？中華文化下的社會，羞恥感具有甚麼樣的意涵呢？
2. 原型、副型、連鎖型羞恥事件是甚麼？這些不同的事件是如何進行社會化的工作呢？
3. 羞恥感教化在中華文化的社會可以達到甚麼樣的社會目標呢？這樣的目標是讓個人懂得自省嗎？

米德 (I vs. Me) 社會化理論，主要是顯現他者對個人社會化所扮演的重要性。對於米德來說一個人有主我與客我兩個部份，主我是具有創造力、主動性的部份，而客我則是代表社會的期望、規範內化成為自己的部份，一個人的行為就是在主我與客我兩者交互作用下，不斷地進展。大體上來說，年紀越大客我的作用越顯著，當然我們要注意到，客我不能超越主我，否則一個人的主動性就不存在，成為過度壓制的社會。從嬰兒時期開始，他們就模仿父母親的動作和行為，雖然他們不知道這些行為的意義，不過這對小孩的成长仍然有影響。兩歲的嬰兒會重複父母告訴他不可以的事情，例如，看到熱水爐，就告訴自己 nono。這個時期，米德稱為模仿期 (imitation stage)，雖然只是模仿但是他人影響力存在的。接著，隨著小孩語言能力的增加 (四到七歲)，就進入玩耍階段 (play stage)，這時他們會玩角色扮演 (role taking)，不過主要是從他身邊的人學來的，特別是父母親，我們要注意這時小孩注意到的，是單一的角色，而不是互動場域中的所有人的角色，這些被注意的人，對小孩特別有影響力的人，稱為顯著的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小孩這時已經逐漸學到規範了，他們扮演別人的角色，知道為什麼這個人要做這件事、行為規範是什麼。這是一個學習同理心，站在別人立場去瞭解他者的開始。第三個階段是所謂的遊戲階段 (game

stage)，這個階段社會化的範圍是更為廣泛，他不僅要學自己的角色，也要了解別人的角色，以及整個遊戲的規則，否則社會互動進行不下去的。就如同棒球比賽，要當一個好的一壘手，當然要和其他八個守備位置的隊友協調，也要配合裁判、教練的規範，這時學的就不是特定他人的意見，而是概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的意見了，也包括觀眾等這些陌生人的意見。玩耍期和遊戲期最大的不同就是，遊戲期的角色演練是相當有秩序的，小孩不可以隨心所欲即興演出，玩耍期的辦家家酒小孩是可以隨意發揮，但是棒球賽就不行了。

(a-3) 平等與分享(強互惠)之道德觀的發展

一群瑞士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討論三歲到八歲小孩的平等主義價值是如何變遷的⁵。他們在分配糖果的遊戲中，這個研究設計的遊戲(game)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順從社會規範的遊戲，這個遊戲是分配者在分配者拿一個而接受者也拿一個糖果(1,1)相對於分配者拿一個而接受者什麼都沒有(1,0)兩個選項中決定要採取那一個分配方式給接受者，由於這兩種選擇分配者都拿一個糖果，所以分配者做任何決定都不必付出代價。選擇(1,1)表示分配者不會壓榨接受者，而是願意看到接受者也拿到一個糖果，研究者由此推論這些小孩是順從社會的規範，考慮到他人的福祉，這可以說是一種強互惠的展現。第二種是嫉妒遊戲，這個遊戲是分配者在分配者拿一個而接受者也拿一個糖果(1,1)相對於分配者拿一個而接受者拿到兩個(1,2)兩個選項中決定要採取那一個分配方式給接受者，這個遊戲的分配者在兩個選項中都可以拿到一個糖果，所以他並不需要付出代價。選擇(1,1)表示分配者是平等，但並不是非常慷慨，不願意看到接受者比自己多拿到一個糖果；選擇(1,2)表示分配者願意在自己擁有一種物品，而希望看到別人比自己過的更好(兩個糖果)，更為積極地考慮到他人的福祉，這可以說是一種更強的強互惠展現。第三種是分享遊戲，這個遊戲是分配者拿一個而接受者也拿一個糖果(1,1)相對於分配者拿兩個而接受者拿到零個(2,0)，這兩個選項中決定要採取那一個分配方式給接受者。選擇(1,1)表示分配者即便付出代價(少拿一個糖果)也要平等的分配資源，很明顯地分配者要考慮到他人的平等、維護別人的福祉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是一種最強的強互惠。研究結果顯現出在這三種遊戲中，隨著年齡增加，選擇(1,1)的比例隨著增加。也就是三到四歲的小朋友是比較自私的，平等主義從五歲到六歲逐漸增加，到七歲與八歲的小孩是最高的。

他們也進一步討論不同年齡層的小朋友對於屬於自己團體的成員和不是團體成員在平等的分配糖果之決定是否有行為上的差異。研究的發現清楚地顯示平等分配在順從社會的遊戲中，分配者對於朋友是比較會選擇平等分配，而且隨著年齡變大而平等分配的比例增加；在嫉妒遊戲中，分配者對於朋友是比較少會選擇平等分配(因為他們選擇(1,2)給自己朋友比自己多的糖果，但隨著年齡變大而

⁵ Fehr, Ernst et al., 2008. (Aug.). "Egalitarianism in Young Children." *Nature* 454:1079-1083.

平等分配的比例增加；在分享的遊戲中，分配者對於朋友是比較會選擇平等分配，而且隨著年齡變大而平等分配的比例增加。最後，性別上的差異是很有趣的，女性受試者的平等主義(嫉妒遊戲)幾乎沒有我群和他群的差別，而男性則是對於自己人和外人差別則是很大。

根據這個瑞士學者所做的實驗，我們可以這麼說從社會行動者在很小的時候，例如，三到四歲時是自私的，不過逐漸地學到平等對待別人的價值，進而選擇一個比較公平的行為方式。

(a-4) 兒童道德發展的理論

對於兒童道德發展的討論，最重要的是瑞士心理學家 Jean Piaget，他的專書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 是專門探討五六歲小朋友到十歲左右的道德判斷原則。Piaget 是從他認知發展理論建立起道德發展論。所以我們先介紹他的認知發展論，他指出小朋友的認知是經過四個不同的階段，如下。第一個階段：感覺動作期(sensorimotor stage)，指涉年齡約介於 0-2 歲的小朋友，在這個階段，他們對於物品的瞭解是透過具體的感知，看不到的物品就不見了，不存在，直到本階段的晚期，對物體的認識才開始有物體恆存性 (object permanence) 的概念。第二個階段：前思運期 (pre-operational stage)，年齡介於 2-7 歲之間，能對語言或比喻進行初步使用，但沒有連貫或系統；以自我為中心，例如問妳有幾個姐姐，回答一個，但問姊姊有幾個妹妹，回答說沒有。看書，她可以看到圖樣，但不知道與她相對面的人只看到書背。第三階段：具體運思期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年齡介於 7-11 歲間，以能夠理解質量不減，並進行數學的基本運算。第四階段：形式運思期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年齡介於 12-15 歲之間，能做抽象思考，如邏輯能力或是回答假設性問題等；這個階段也會形成道德能力。

Piaget 提到小朋友的道德發展是經過客觀道德原則(他律)到主觀道德原則(自律)，前者是來自於權威、成人或是社會群體的要求，所有犯錯的人就是要依照行為的結果依比例處罰，完全不必考慮他的動機，不必考慮他在什麼樣的社會情境下犯錯，也意味著我們不必去試想他人的處境、犯錯的理由，有錯就採取報復性或賠償性處罰，這是一種單向的(unilateral)道德觀。而主觀道德原則是來自和相同年齡、經驗的同儕互動，透過同理心或是瞭解他人角色後發展出來的，所以年齡比較大的小朋友他會試著去瞭解他人犯罪的理由、動機，考量他犯錯的社會結構因素，給予適度的處罰，或者給予修正改過的機會，而不見得是賠償性處罰。對於他人處境與動機的理解和反思是基於行動者的成熟認知能力，以及自我的道德良知。這是一種從個人責任或義務出發的道德觀，行動者對於自己要不要遵守道德原則是來自內省的標準(這是 Douglas 的罪惡感相似、也和 Kohlberg 的良知原則、康德的理性倫理學原則類似)，對於其他社會成員也將他們當成獨立

的行動者，瞭解他們的行為動機和處境，判斷他們道德上的過失和處罰的程度，而不是機械式的對法律和規則服從、執行。

根據 Piaget 的論點，客觀道德(他律)原則強調行為結果，六歲以下的小孩採取客觀原則，在分配時考量的是自己的好處，不大會想到他人的處境。年齡越大就越有能力考慮別人的狀況，分配物品時採取平分的 equality(平等)立場，年齡更大就越傾向於採取考量不同能力與處境的 equity(公平)的立場。隨著年齡發展的平等、公平價值在瑞士學者實驗得到支持。

另外一位討論兒童道德發展的重要學者是哈佛大學的 Kohlberg, L. (1963)，他引用 Piaget 的理論(階段論、認知發展有助於道德發展)，發展出道德發展論。

1. PREMORAL (主要的道德依據是生理與天生下來享樂避苦的，可以說是功利主義的原則)

1st stage Obedience and punishment Orientation

2nd stage Naïve hedonistic and instrumental Orientation

2. Morality of Conventional Role Conformity (社會他人的存在和反應造成影響)

3rd stage “Good boy” morality, approval of others.

4th stage Law and authority maintain morality

3. Self-Accepted Moral Principles (社會價值的學習經過個人的反思後成為自己的判斷依據)

5th stage Morality of contract, individual rights.(平衡個人與社會的權利，考慮到不同道德或價值的衝突)

6th stage Morality of individual principles of conscience.(良知、自我譴責)

a. 從自我中心到對他人的考量、從被動到主動、從外控到內控。

b. 階段性的，但這階段與年齡沒有必然的關係，成年人不一定發展到最高階段。女性主義者 Gilligan 批評這是以男性為中心的道德發展論，忽略女性社會化過程道德發展取向是以人群關係為中心，注重人際連帶與社會責任，而不是以抽象冰冷的道德原則為中心。

(b) 學校社會化與課外活動

學校社會化主要是透過正式教育體制傳遞社會的價值、知識內容和必要的技能，我們將在下一個學期「教育制度」課程中進行充份的討論。藍佩嘉(2019)的論文對於學校當成複製階級地位關係也有提出一些討論，

不過一個比較少被注意到的議題就是台灣學生普遍在下課或是假日所進行課外活動(才藝學習)和家庭背景有甚麼樣的關聯性？對於學生又造成甚麼樣的影響呢？石易平(2019)運用中央研究院蒐集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資料庫的長期追蹤資料討論這個重要的議題。她引用美國社會學者 Laureau 的論點，提出一個假設，那就是「中上階層的家庭，藉由課外活動從小建立孩子秀異的履歷表，除了將自身的階級優勢代間傳承給下一代之外，更期待藉由課外活動，建立起子女的自尊自信與權威感，進一步鞏固他們在教育以及職場的優勢文化地位」，所以除了正式教育體制複製社會階層的位置外，非正式但非家庭內部的教育(課外活動)更是一個延續並鞏固優勢家庭子女地位的重要作為。

教育程度高、經濟地位高的家庭子女，學習才藝種類多於教育程度低與經濟地位低的子女。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在同樣經濟與教育地位的家庭，家長偏向於民主價值者比偏向權威價值者會讓子女學習更多樣的課外活動。其次，學習鋼琴是最具有區辨家庭階級地位的活動，中上階級的子女比勞工階級子女多出兩倍機會學習鋼琴。第三，學習書法和藝術創作課程和階級地位有明顯關係，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可能讓子女去參加這樣的活動。但是藝術活動的女性比男多，而書法則是沒有性別差異。第四、舞蹈與書法是學生課外活動參與項目比例最低的，但是舞蹈主要是女性參與(男性只有女性的 8%)，而棋藝男性則是女性參加機會的 3.5 倍，很明顯的跳舞是被家長設想為培養陰柔氣質的活動，而下棋則是訓練推理與邏輯思考能力的活動，前者屬於女性特質，而後者則是屬於男性特質。第五、體育課外活動則是沒有家庭階級背景的差異，不同階級家庭出身的小孩都有相同機會參與，不過還是存在著性別差異，男性參加機會是女性的兩倍。最後，才藝活動和成績的關係非常明顯，成績排名越好的學生參加的才藝活動越多。如果我們把電腦課程挑選出來分析，就會發現成績越好的學生有比較高的機會(1.3 倍)參加這樣活動、男性是女性的 2 倍、家庭階級地位越高參與的機會越大。總結來說，小孩參加課外活動的數量和種類是受到家長的社會經濟背景、家長的價值觀、子女的學業成績表現與性別屬性所影響。參與課外活動是複製階級、性別和家長價值的一種社會化機制⁶。

(c) 同儕的社會化

同儕社會化主要是由年齡相似、生命階段遭遇相同問題、背景相似的人所組成的團體，這些團體相對來說社會化的作用者與被社會化的對象之間是平權的，所以他們是以建立歸屬感、情感支持為主，當然同儕團體的社會化也有認知或者說知識學習的部份，不過前者顯然比後者重要。同儕的社會化對於青少年來說，是脫離家庭，轉變成獨立的個人相當重要的階段。同儕提供一個青少年躲避父母

⁶ 同前引文。

親、老師或外在社會監督的避風港，這也是轉變成為成年人重要的部份。此外，對於青少年來說，交朋友是相當重要的，有三成的國中生指出他們最希望達成的事情就是交到朋友，可見情感支持對青少年的重要。在社群媒體普及的狀況下，許多社會行動者可以即時、多元、雙向的和自己的朋友(特別是同儕)交換訊息，同儕團體的影響力是更為顯著的。他們可以跳脫區域、社會背景等限制廣泛的結交各式各樣的朋友，訊息替換速度快(從 30 年到 2 年一個週期)，青少年可以更主動、更積極的建構朋友網絡，滿足青少年已結交朋友為主要目的的網路使用行為⁷。從正面角度來看在網路世界，當青少年使用網路交友網站次數越多，更有可能交更多朋友，而且使用頻率越高對於他們的自尊和主觀福祉有間接提升作用。當他們從網路互動得到正面回饋，自然提升自尊和福祉⁸。

同儕社會化的機制是:1)集體的活動是展現出同儕凝聚力相當重要的動作，透過不停的群體活動來強化同儕間的關係，增進社會支持和歸屬感，這些群體活動在他人面前的展現，從別人的回應，再由成員詮釋別人的看法，形成團體的意識和團體的榮耀。許多集體的行動也表示同儕需要長時間在一起，並且建立起較緊密的關係。2)透過遊戲的參與，瞭解社會的規範和運作方式，而不必是去取得一個固定的職業來瞭解社會。3)社會比較的過程(social comparison)，以同儕當成座標點，來瞭解自己的能力和特色。

Granfield 研究工人階級出身的常春藤大學法學院學生的社會化，這是一個在正式專業學院的場景底下，下層階級在身邊都是出身中上階級家庭同學、高收入法學教授、尋找出身背景與生活風格相同的著名律師事務所的雇主之日常生活情境中，這些學生掩飾自己低下出身而學習菁英階級的談吐、衣著和職業生涯的過程，也是學習一種新的身份認同(identity)。對於 Granfield 來說，學校或專業社會化是一種學習知識與技藝，但同時也是一種學習價值、身份認同的過程。特別對於身份不同於學校主流群體的學生來說，這是一段劇烈調整的歷程，他們要放棄舊有的認同，取得新的身份；他們不見得能夠得到主流社會群體的接納，而且他們原來身分群體的成員可能也會指責他們的改變是出賣靈魂，使得他們處於衝突矛盾的狀態。

Granfield 是引用美國經典的社會學者 Ervin Goffman 在《*Stigma*(污名)》一書的主要概念來深度描繪這個非常劇烈的專業學院同儕社會化的歷程，Goffman 指出那些具有社會視為不正常特徵的人，例如，肢體殘障者、犯罪者、脫衣舞者等，他們和別人互動時大多會透過一些技巧(passing, deviance disavowal, accounts,

⁷ 陳俞霖. "網路同儕型塑及對青少年社會化影響之探討." *資訊社會研究* 3 (2002): 149-181.

⁸ Valkenburg, Patti M., Jochen Peter, and Alexander P. Schouten. "Friend networking sit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adolescents' well-being and social self-esteem."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9.5 (2006): 584-590.

disclaimers, covering)去整飾(management)他們的缺陷或污名，讓社會互動可以順利進行下去，並且維持自我的認同。當然要透過操弄資訊來保持身份認同或是取得新身分認同，身份特徵是可貶而非明貶的比較容易達到目的，以種族與性別，相較於階級，後者就比較容易掩飾或操弄資訊來創造身分認同。而操弄資訊得到的身份，雖然可以取得別人的接受，但是對於操弄者仍然有心理上的壓力。為了解決壓力、解決操弄身份認同的心理衝突，他們會像脫衣舞者正常化(normalization)[拒絕承認自己的工作造成對社會的傷害、譴責那些指責他們的人、或訴諸更重要的價值與生活目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中立化(neutralization)。

在取得菁英法學院入學許可時，這些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都充滿著成就感和改革階級不平等的理想，但是入學不久來自於課業的壓力、來自於談吐與穿著方式的階級差異、多數是來自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大學部的同學、教授課程內容與授課方式的中產階級偏見，都讓這些學生感受到強烈的差異、非常大的心理負擔，所以 Granfield 說他們有那種鄉關何處的感受(feeling out of place)，當他們和那些菁英同學、老師互動越多，感受越強。入學不久，工人階級出身的學生就面臨的選擇，要繼續維持他工人階級認同或是加入中上階級，大多人選擇後者，但是藉由掩飾污名身份與假扮新身份來達成這樣的目標。這些學生開始避免揭露自己工人階級的特徵，模仿同學的說話和穿著方式，讓自己看起來不再是外來者。當然要加入優勢階級除了心理負擔之外，也是有取得實習機會、找到高薪工作等誘人的經濟性報償。

即便這些選擇加入的工人家庭子女在法律學院畢業後得到想要的機會和成就，但是他們還是常常會感覺自己是外來者。就像法國革命家法農(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所描寫的講一口流利法文的黑人仍然是充滿自卑情結，是法國主流社會的外來者，這種透過掩飾與假裝取得的新身份是解決不了身份衝突的矛盾。再者，當一個外來者，他總是記得自己的低下身份，對自己的身份的自卑使他們必須要透過心理學的補償機制(compensation)的機制來解決[當一個人在一個面向覺得低劣，他會在另外一個面向尋求更好的表現來補償]，但是通常自己也無法確認別人是否肯定他的成就是靠自己努力達成的。最後，工人階級身份與新身份的矛盾還會來自於學生面對自己的家人、朋友，那種拋棄改革理想、出賣階級成員的負面感覺不斷地讓這些學生感到愧疚，迫使他必須調解這樣的身份衝突。他們解決的策略和脫衣舞者是具有類似性的，一方面，他們訴求更高的理想和目標，大多數人認為進到大公司可以累積財富與人脈，對於未來的社會改革是比較有幫助的，不必一開始就當公益律師；另一方面，有些人則是完全拒絕他們曾經有的理想和責任，高薪收入的律師仍然是一個好公民，為什麼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呢？這是一種給自己與外界的合理說法(account)。或者，他們會指責那些要求他們履行協助工人階級責任的法學院同學，就像脫衣舞者指責她們的公民或媒

體。

讀完這篇文章需要掌握議題:

1. 為什麼工人階級出身的精英法律學院學生開始入學會有邊緣和差異的負面感受呢？
2. 他們是透過那些技巧或作為來掩飾自己的出身呢？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3. 他們掩飾身份與選擇轉變成中上階級會碰到甚麼樣的矛盾呢？這些矛盾如何解決呢？

(d) 職業社會化

職業社會化是通過預期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或(及)是在職訓練(On-the-job Socialization)等兩個機制完成的。職業社會化所面臨的四個困難為：1)科層組織的現實狀態；2)習慣抗拒變遷，不喜歡新人的創新建議；3)解決工作內容與工作評價的模糊內容；4)新員工要學習超越與瞭解組織的限制，如何在改變與現狀中選擇。為了讓職業社會化順利進行，通常是有職前訓練，讓將要工作者瞭解工作的狀況，然後進入到在職訓練，再到全職工作的歷程。有些研究指出，職前訓練的完備性、在職訓練是否有恰當的顯著他人當成模仿對象是影響職業社會化成敗的因素。我們也可以發現所謂專業性越高者，職業社會化的時間是越長的。

職業或專業，以醫師為例。首先，要注意到就讀醫學系學生的背景，大多是屬於中產階級，而將近半數的醫學生家族中有人當醫生，醫學生同質性非常高。就讀醫學院的動機，收入高、有地位、有成就的例隨著年級越高而提升。一般來說，醫學生的生活經驗和一般人是相當程度的隔閡。解剖學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醫學生在面對屍體的情境下，逐漸發展出去情感的關切，對於他人、病人不能有太多情緒上的投入。另外，醫學院強調專業和學術成就，也使得對於病人的關切成為是次要的，技術面反而是主要的。在醫院實習的過程當中，親身觀察主治醫師主導醫病互動關係，透過觀察、角色模仿與學習、實際的角色操演、小團體討論以及恩師的現場指導，醫學生很快的學會醫生的角色和行為模式，這種權威性的互動模式也成為建立專業權威的一部份，權威是宣稱一個專業必要的元素。以醫生職業的專業化來看，分成三個部份，學生同儕團體高度的同質性，有利於專業化的進行，卻是不利於多元化醫病互動模式的形成；課程學習的專業化，則是以技術為主，至少是主要的評價標準，當然無助於病人照顧當成專業化的核心議題；實習過程來自於資深醫生角色模式的學習，其實只是不斷的在複製權威的專業驕傲。

大多數對於職業社會化的研究都聚焦在醫師、律師、工程師、會計師等專業行業的工作者，他們高薪、受教育時間長、社會地位與聲望高，當然也是社會的菁英階層，這次的指定教材選擇一個對照這些專業職業的特殊行業-脫衣舞者的職業社會化，來比較受到社會尊敬職業與具有負面評價，甚至於污名(Stigma)的職業的社會化歷程及其產生的影響是否有差異。

	女性脫衣舞者	醫師
預期社會化	有	有
	非正式管道為主 *透過擔任這些工作的朋友所提供、讀相關報導、或是在脫衣舞酒吧當服務生現場觀察，多數工作者預期社會化相當有限(經紀人提供資訊、過去從事娛樂業、接受過舞蹈音樂訓練者非常少)	非正式與正式管道並重 *醫學生多出自家族有醫生的環境，家族成員提供充分資訊和影響的非正式預期社會化 *醫學生在學校的正式社會化，特別是臨床課程、實習醫生及各式各樣的醫學會
在職社會化	是	是
	非正式管道 *主要都是由現場舞者提供的經驗、伴舞的協助等，Peer 是最重要的社會化提供者	非正式與正式並重 *住院醫師、專科醫師的訓練 *師徒制的緊密互動關係，其他資深醫護人員的現場意見提供
處理職業污名化的必要性	是	否
	處理的策略：1)否認從事這項工作會造成顧客或整個社會的傷害；2)批評或譴責那些譴責脫衣舞者的人；3)訴諸更為結構因素或是更重要的目標及價值(輔養小孩的義務)；4)正常化或合理化這個職業手法的使用	
職業當成一種生涯目標	是/否(有些是) 1. 長期生涯規劃的舞者 2. 短暫目標取向的舞者(學歷較高、擁有其他技能、較少與其他舞者往來、較缺乏社區支持建立正面的自我認	是(很少接受醫學教育的年輕人選擇兼職或是將醫生當短期職業)

	同)	
影響進入職業的原因	1)財物上的需求;2)工作報酬相對高;3)人際網絡的引介;4)有相關的資訊或接觸這個職業的機會	1)經濟上的因素;2)社會地位與聲望的因素;3)人際網絡(特別是家族);4)典範角色的影片或書籍的感召;5)有相關的資訊或接觸這個職業的機會
職業社會化的負面影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對於親密關係(家庭、親密關係)的負面影響。2018年台灣出版日本成人女優紗倉真菜的異色小說「最低」，對她的訪談她就提到她完全放棄異性親密關係、放棄未來有家庭的可能。 對自我認同負面影響(欺騙家人、職業保密與封閉的生活方式) 對於未來職業流動與生涯規劃的影響(相當多舞者停滯在這個工作上) 	職業角色的技術化與工具化，失去工作照顧病人、維護病人生命的核心意義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如果我們將脫衣舞者和工人階級精英法律學院學生的職業社會過程進行比較，就會發現脫衣舞者是因為取得的職業身份認同是一種偏差的、不被法律規範所接受的，是一種向下沉淪的過程，因此他們必須要面對社會大眾對於他們的指責。取得這種汙名的身份，他們正常化、中性化、合理化的做法，就是透過前面提到的印象整飾諸多作為，但這仍然會造成心理壓力和身分衝突。特別是兼職型的脫衣舞者，汙名身份和正常學生、子女的身份是衝突的，他們要透過(faking it)欺騙他們的父母親來掩飾脫衣舞者的身份，造成他們很大的壓力。職業型的舞者也會有同樣的問題，傷害的範圍更廣，影響的時間更長。工人階級的法律學院學生則是取得向上流動的精英身份認同，透過掩飾與欺騙得到新的身份，但是他們主要的壓力是來自於工人階級群體成員，為了維持新的身份，解決新的身分衝突，他們採取的做法和脫衣舞者是類似的。只是勞工階級法律學院學生得到好工作、優渥薪資、一般社會大眾的認可，脫衣舞者則是很難真正解決她們壓力和身份認同。

(e) 長者的社會化

長者的社會化和前面提到的階段有相當顯著的不同是在於，失去既有的社會位置或是角色(roles loss)，或者是角色逆轉(role reversal)。從兒童階段，一般人都是在學習取得這個社會認為有價值、有意義的社會位置，例如，職業位置、工作角色，但是老人則是要學習放棄這些社會認為重要的位置和角色，因為退休年齡的限制必須要離開這些工作，當然也可能會造成老人失去生活的意義感。此外，過去成年人工作就是要維持家計、養育子女，是一個資源提供者、照顧者、家庭主要決策者、社會貢獻者的角色，但是隨著退休，收入減少、體力衰退，無法提供家庭經濟支持，轉換成被照顧、被撫養的對象，這是一個非常顯著的轉變過程。對於老人來說，角色喪失和逆轉很可能帶來心理上非常大的壓力，而導致痛苦和焦慮。成年子女如果沒有改變對父母親的期待，觀察到父母親的依賴和脆弱，自己也會有焦慮感、衝突感。如果子女又承擔非常辛苦的照顧責任，那麼親子衝突將大幅提高。根據衛福部家庭暴力通報事件的統計，老人虐待的次數從2010年3193，增加到2016年7046件，其中女性受虐者又遠高於男性⁹。

老人的生命週期除了這些重要轉變外，還可能會出現對於未來的焦慮和恐懼，主要是擔心喪失生理和心理上自我照顧的能力，以及來自於死亡的懼怕。老人的社會網絡因為退休、朋友的死亡而逐漸減少，失去重要的社會支持，對於年長者的生活產生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德國社會學者 Elias 寫了一本《*臨終者孤寂*》的小書，就是在論述當代社會將死亡當成是個人要面對的事務。年長者隨著安養機構的普及化，使得「老年人離開了舊有的生活並和陌生人共處，意味著個人的孤寂」，接著，年長者因為重病可能會送入安寧病房，「過去真正不時為臨終者帶來安慰和幫助的，乃是其他人的陪伴」(p.72)、「今日則不再如此。在人類歷史上，臨終者從未如此衛生地從生者的視野中消逝，退居於社會生活之幕後；人類屍體也從未如此無惡臭地、以如此完美的技術自太平間移送至墳墓中」(p.88)。這樣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安排，使得年長者社會化的過程缺乏來自他者的互動和支持、缺乏其他人角色的模仿和學習顯得更為困難。

(f) 再社會化

再社會化可以分成志願性的再社會化與非志願性的再社會化，再社會化通常是發生在軍隊、監獄、精神病院、移民以及集權政黨，因此相關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這些機構為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戲劇論大師 Ervin Goffman 對於精神病院的研究所寫成的《*精神病院：論精神病患與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一書。對於 Goffman 來說監獄或是精神病院就是一個全部控制機構，是一個把不同生活領域(工作、休閒和睡覺)的邊線打破，讓它們都發生在同一個空間，這個空間和外界

⁹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6954>

是隔離的，並且由一個權威者來管理。所有在機構的人都是同一種生活規律，每個人都依照同樣的規定活動，這是由上面的管理者所決定。接著，在這個全控機構中的收容者，都是被監督和定期檢查，只要犯錯就會被懲罰，以確保順從的行為。第三、在全控機構所有資訊是被重重限制的，以避免收容者受到外部的影響，也讓管理者可以執行他們管理的工作。

一個全控機構與外部隔絕，因此一個人進入就必定會產生和過去各種角色斷裂的過程，或者去文化或去訓練的過程，特別是讓這些入住者不能外出，首先，所有的人要透過入院的標準程序去除他過去的角色，理頭髮、洗澡、換制服、編號等等，讓他變成一個類屬、一個沒有獨特性的成員。再來，透過順從測驗來持續確認入住者是遵守管理者設定規則，這是一個摧毀入住者意志的過程，不斷的檢查入住者的空間、行為舉止，找到小問題進行處罰，直到入住者求饒為止。第三、順從測驗也是攻擊入住者過去身分的過程，例如，要求用湯匙吃所有的事物，而不是一套完整的餐具；或者要求做出丟臉的動作，交互蹲跳或伏地挺身等等，可以讓一個成年入住者顏面盡失；或者透過污染性暴露來羞辱入住者，挑戰過去的身分，心理性的污染性暴露是揭露個人歷史、隱私、宣讀家人的來信等等、而物理性的污染性暴露則包括排泄時間兩分鐘且是公開進行、不同種族或是性別編列在同一居住空間、要求觀賞鞭刑或是鞭打其他入住者等等。入住者會因此降低判斷力或是語言能力，造成自我的損毀。最後可能是完全接受全控機構的規定，那就是一種轉化身分和角色。但這個全控機構基本上是死海，死氣沉沉的，所有的時間都是用來打發的，是浪費掉、報廢的時間。入住者要適應通常採取的是忘我的活動，自願的投入一些細碎、無聊的事情，全神貫注讓自己忘掉身分、忘掉痛苦。

再社會化的步驟：隔離(空間上、衣服符號上、身體上)、舊身份的攻擊(配合告白認錯、別人的指責、懲罰)、捨棄舊價值與認同、再生。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的歷程首先是去除社會成員過去的信念、價值、地位、身份認同與人際關係，因此一開始儀式性的消除所有過去的象徵是必要的。接著下來在緊密的人際互動和精心設計的新互動規則下，社會成員開始學習新的價值、身份與信念，這個學習的過程經過認知學習、情緒轉換和重複的操作模仿。

監獄的再社會化，其實是有一個目的就是幫助受刑人能夠回到正常的生活，不再有犯罪行為，這個目標是不容易的。主要的原因是，監獄的再社會化本身的環境是高度控制，缺乏讓個人發展出自主的控制能力，而且監獄高度的暴力行為、男性陽剛特質(憤怒情緒但無法陳述)是有負面的影響，特別是在情緒和行為面。有些研究也發現在監獄當中，對於個人正面的自我認知回饋、積極性的對照角色典範都欠缺，個人從別人的看法中如何發展出一個正常的自我想像(looking-glass self 的概念)，進而表現出正常的行為呢？另一方面，在監獄當中，

受刑人也缺乏一種來自守法角色的關心、情緒照顧支持的社會連結，讓他發展出守法角色的認知、情緒認同，降低憤怒、悲傷、無助的情緒感受，給予自我正面的情緒，改變他的行為模式。

三、社會化基礎理論的介紹

(一) Freud(心理分析學派)

“I am happily married. I am a reasonable person. But in making a movie, I like to touch the unknown. Sometimes, you get to this scary truth about your own subconscious existence.”-----Lee An (*Time* 2007,10/15,48) (named as Wizard of Id.)

佛洛伊德基本上從行動者的潛意識或生物性的原慾出發，來看個人的社會化要克服的問題，以及沒有成功的克服這些問題對個人人格造成的問題(例如精神疾病的發生)、對於性別角色的區分形成的影響等等。首先，一個行動者有潛意識衝動與慾望的部份，他稱為本我(Id)，Id 是根據享樂原則(the pleasure principle)，也就是滿足慾望出發；外在社會的文化、價值與規範以超我(Superego)來代表，通常透過母親、父親來影響社會行動者，一定程度馴化社會行動者的 Id，所以超我是按照道德原則(the morality principle)。如果社會行動者能夠將以 Id 和超我成功整合到自我(ego)，就有比較恰當的人格發展，自我是根據現實原則(the reality principle)。其次，他將一個人從出生到兒童必將經歷口腔期、肛門期、陽具崇拜期、潛伏期、生殖器期等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一個關鍵性原慾危機要克服，克服的過程一定包涵愛恨、接近與分隔等衝突，如果克服的好，個人的人格會有完整的發展、超我會發展出來，並且進入到下一個階段接受挑戰。如果沒有克服成功的話，就會出現心理上的症狀。

對於佛洛伊德來說，陽具崇拜期是社會化最重要的階段。在這個時期，小孩存在著戀母情結(伊底帕斯情結)與閹割情結，子女和父母親的關係出現關鍵性的轉變，男孩對於母親的依戀在父親閹割陽具的威脅下，疏離出來，痛苦的壓抑戀母情結，轉而發展出對於父親威權遵從與內化父親的價值，這時超我生成。小男孩經過壓抑戀母與閹割威脅的創傷後(完全解決戀母情結)，變成男人，變成拓展社會文明的男人。女孩在陽具崇拜期出現陽具嫉妒，因為她的缺憾而自我想像的成為次等的成人，陽具的欠缺造成女孩對於母親的怨懟，成為女孩疏遠母親的原因之一¹⁰。女孩遺棄母親¹¹，試著將她自身帶入母親之於父親的位置，女孩

¹⁰ 心理分析討論男孩與女孩的社會化，都指向與母親的切割，轉向一個異性戀的過程。只是男性的異性戀必須排除母親，這個轉折是相當困難的。

¹¹ 在戀母情結期(也就是陽具崇拜期)，女孩遺棄母親轉向父親真的是因為陽具崇拜嗎？女性主義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女孩對於母親的憤怒是因為母親和女孩的原初認同、原初的愛、共生關係，

逐漸轉移她原來對於女性的愛戀到男性，從佛洛伊德的觀點女孩將原來愛戀的對象從女性轉到男性(男孩愛戀的對象一直是女性)，造成女孩人格上許多的問題，如自戀、虛榮等。也由於女孩沒有經歷男孩被父親閹割威脅的痛苦¹²，也就是說女孩沒有完全解決戀母情結，所以沒有因為恐懼去內化父親的價值觀，因而無法發展出強固的超我，道德感較為薄弱，無法成為文明的人類。

口腔期是吸食、肛門期是因為大便與小便的訓練、而陽具崇拜期則是性慾，在佛洛伊德的理論中我們已經提到過最重要的時期是陽具崇拜期，不過現在有相當多的文獻討論口腔期在社會化的重要性，特別是心理分析的女性主義理論，她們挑戰佛洛伊德的論點。安娜·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女兒)曾說「在口腔期，母親只是代表象徵了那無可避免的沮喪，就像在伊底帕斯階段(陽具崇拜期)中，父親只是代表了那無可避免的陽具沮喪。要了解拒絕的母親這個新概念，就像要理解閹割的父親這個舊概念一樣」(引自 C103¹³)。女性主義者夏德樂(Chodorow)整理其他學者的討論，她指出口腔期嬰兒(男、女)、母親與父親的三角關係，影響無性別取向的嬰兒慢慢分化為男、女性別的意識。她先討論女嬰與母親的關係，嬰兒一出生是沒有自我與別人的區隔，嬰兒認為母親和自己是一體的，嬰兒認為母親對自己的付出應該也是無盡的，但是慢慢的(半歲以後)她發現母親和自己是分割的，母親有自己的利益，嬰兒會感到痛苦，但是她要學習克服這個痛苦，形成一個整合性的自我(an integrative ego)。如果母親給予嬰兒妥適的照顧，則有助於嬰兒克服分離困難、克服口慾不會是被享樂原則的滿足等問題，如果母親不給予適當的照顧，女嬰不容易克服困難，遭遇到許多挫折，嬰兒將挫折內化(Introjection)而不去面對，形成一些有問題的個性。不過母親也不能太過於照顧嬰兒，也就是照著嬰兒無盡的需求去滿足，這樣造成另外的一種有問題的個性，就是嬰兒超我內化到自我的部份出不來。

口腔期對於母親也有很大的影響，母親透過對嬰兒的照顧，產生一種完全退化的認同，就是認同嬰兒，認為嬰兒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這樣的態度。母親是因為哺乳、懷孕等因素，將嬰兒視為是自己的延伸，將嬰兒的利益當成自己利益，從照顧嬰兒中得到滿足，從對於嬰兒的照顧中再去喚醒母親自己和她幼年期和母親的關係，特別是當一個好媽媽，是認同自己母親的表現，也再一次獲得好母親的心理感受，所以女性是擔任母親的唯一性別(不過這種論點是被夏德樂所批評

使得女孩體會到母親無盡的愛，但是所有愛的關係終究是要瓦解的(這是心理分析基本的立場)，越是堅強的愛，越難分割，但是一定要分割，所以造成極大的憤怒。所以無所不能與主動的母親，對於兒子和女兒都造成了一個自戀的傷口(自我的整體被毀滅、無力感)。男孩的解放卻是比較容易的，因為男性特質與陽具的擁有。這可以輕易的讓男性發現母親不是完美萬能的。(C156-157)¹²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女孩在脫離母親轉向父親的同時，其實也是一直在注視著母親，希望贏回母親的愛，轉向父親要看看母親會不會嫉妒，攻擊母親其實也是表達了對於母親的愛(C162)，這裡當然也質疑異性戀是否為必然的理論觀點。此外，沒有完全壓抑戀母情結一定不好嗎？說不定是發展出更妥適的人格特質。

¹³ C 指的是張君玫譯，*母職的再生產：心理分析與性別社會學* 台北：群學出版社。2003年。

的，這樣的說法一旦成立母職由女性擔任是有生物性的、原生心理的基礎，所以是不可改變的。男性不能擔任母職嗎？)。

女性主義者認為男孩與母親澈底的分離，造成他再不能與他人結成親密關係，此一不能剛好成為男性在公領域的表現打下基礎，公領域強調效率、無私、當仁不讓等，女孩與母親的斷裂不是絕對的（完全壓抑戀母情結），因此保有體會他人的柔性特質(冬恩，1996: 230-270)。有女性主義的學者特別去探討，前戀母情結期(也就是口腔期)，女孩/男孩與母親的關係。首先，女孩對於母親依戀的強度是比男孩要強，而且前戀母情結的時間也比男孩長，造成女孩與母親的關係難以斷裂。其次，男孩比女孩更早，就將父親當成愛恨交織的客體，也就是說男孩更早啟動以父親為對手、也是社會化的對象，女孩這時還依戀著母親。第三、母親對於女兒的態度與對兒子是不同的，母親傾向於將女孩當成是自己的延伸，這樣的態度使得女兒不容易發展出和母親絕對的斷裂，因為母親沒有放手讓她獨立，母親對於女兒的原初認同、共生狀態是強的，因此對於女兒的心神專注（愛戀）是具有自戀的部份。可是對於兒子，母親到了一段時間（兒子兩三歲）就不可能視為自我延伸，因為兒子是不同性別，可能成為母親潛在的性慾他者（心理分析學者認為這樣的誘惑是存在的）(C133-139)。

佛洛伊德的理論在心理學、女性主義的領域相當盛行，心理分析學者認為許多身心疾病的產生是因為病人未完成各階段的障礙，達到最成熟的階段。如口腔期性格，貪吃、期望立即滿足、缺乏耐心。陽具期性格則是愛慕虛榮、自戀等。女性主義認為佛洛伊德的貢獻是在指出男女人格發展過程的差異。佛洛伊德的限制理論：性慾或是潛意識決定論，也可以說是一種生理優位的理論。早年的心理發展決定成人的人格，忽略持續的人格發展。單線發展論，忽略差異性與社會制度安排所發生的影響。

佛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理論討論的焦點在孩童社會化，以及性別的社會化，其實性別的社會化在兒童階段之後，還是持續在發生的。

家庭社會化中的性別差異：

- 1.家長性別刻板印象在與嬰兒語言或肢體互動造成後續的性別角色差異，男性是公領域主導者，女性則待在私領域。
- 2.透過玩具選擇的社會化，家長對於不同性別的子女玩什麼玩具較恰當有一定的看法，兄弟姐妹的影響可能更為直接。
- 3.家長透過家事的分配強化性別分工。
- 4.家長透過對於不同的性別子女的期待造成差異的社會化。
- 5.角色模仿或觀察的社會化，母親不外出工作、母親有的工作收入地位都比父親

低、母親在家中沒有決策權等，子女從看到的角色中複製自己的性別角色。

學校社會化中的性別差異：

1. 老師對於男女性學生互動的方式、密度、成就期許不同(男性要競爭、女生要體貼或溫柔)。
2. 學科能力的刻板印象。
3. 學校的結構，如小學老師大多是女性，男性當校長，沒當校長的男老師是比較差的、比較沒有成就的。
4. 學生互動的模式，如男生主導討論、表現強式的態度等。

大眾傳播媒體中社會化中的性別差異：

1. 戲劇或廣告角色的刻板印象，八點檔女性的角色很少從事重要職業，多為身體美容的廣告。
2. 媒體的內容傳遞性別刻板印象。
3. 媒體從業者的性別角色強化既有的性別刻板印象。

(二) Erikson 的社會心理危機

- 1 trust vs. mistrust(父母的關心與存在)
2. autonomy vs. shame and doubt (1-2)(自主的走路、大小便的訓練)
3. initiative vs. guilt (3-5)(與幼童互動、衝突與合作、好奇、想像力)
4. industry vs. inferiority (學齡期)(智識的學習)
5. identity vs. role diffusion (青少年)(性別角色的認同、同儕團體的自我定位)
8. intimacy vs. isolation (年輕期)(組成家庭)
9. 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 (中年期)(中年危機)
10. integrity vs. despair (老年期)

解決危機是社會化的重點，危機解決的好不好影響社會化的或適應的好壞，解決一個危機社會行動者將面對下一個生命階段的新危機。

Erikson 擴大佛洛伊德思考的範疇將社會心理危機納入人格發展中，而不只限於性慾或是潛意識的生理盲動。而且將社會化的時間軸線拉長到老年期，承認人格發展是終其一生的。

對於 Erikson 的一些批判:

1. 這些危機是 Erikson 研究馬丁路德而來的，是一種男性中心的思考，女人認同的危機在那裡？

- 2.人格發展基本上是個人的事情，個人要去解決危機，忽視社會制度的影響。
- 3.Erikson 所定義出來的社心危機所參照的對象是想當典型的中產、白人、資本主義、男性的價值觀。

(三) 符號互動論

我們前面提到的米德(Mead)和庫禮(Cooley)就是符號互動論的代表性人物。